

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

宋宏梅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发生和逐步得到解决,根本原因在于老挝国内冲突和对外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得益于老美关系、老泰关系的发展。难民问题的解决,关键要看难民来源国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另外,生活在难民营里的老挝苗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难民问题的解决创造了相应的条件。与此同时,难民接受国对难民来源国是否采取相对友好的政策;难民营能否接受外来援助;难民接受国能否积极推动难民移民第三国等也是促成难民问题得到解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老挝苗族;泰国;难民营;难民问题;变迁

中图分类号:D8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6)03—0101—05

DOI:10.13848/j.cnki.dnynybjb.2016.03.017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对周边事务的参与力度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更加重视当前的全球性危机——难民问题。曾经影响很大的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对这一问题进行回溯式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应对周边难民潮、如何管理难民营、如何解决难民滞留等问题多有可资借鉴之处。在学术层面上,我国对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研究几近空白,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也属必要。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特别是关注聚居在难民营的老挝苗族难民。老挝苗族和难民两个概念均有歧义或多解,本文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厘清。再从进入和离开难民营这两个的角度切入,梳理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补充国内尚缺的资料和数据。在概念和宏观事实已经论述完备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挝苗族难民的状况展开论述和探讨,以期对该问题做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一、两个概念:老挝苗族、难民

(一) 老挝苗族和 Hmong

本文所使用的“老挝苗族”一词指的是老挝境内的苗族和与这部分苗族有紧密联系的,生活在老挝之外的苗族及其后裔,包括生活在西方的和生活在泰国难民营的苗族。

东南亚苗族自称 Hmong,这一称呼随着老挝苗族流散到全球而被很多国家所采用。相对于 Hmong,“在汉语语境中,苗族是大的族群统称,而在英语语境中,是 Hmong 而不是 Miao 成了大族群的统称”。^{[1](P223)} 所以, Hmong 和苗族的主要区别其实是语言学上的,而不是民族学上的。对 Hmong 的翻译有“赫蒙”、“蒙”等。西方文献中也有时用“Miao”、“Meo”等词称呼东南亚苗族,尤其是早期文献。本文将 Hmong 等西方文献中出现的苗族的不同称呼都统一翻译成苗族。这符合苗族研究的规范,也符合中国约定俗成的习惯。

收稿日期:2016-08-01

作者简介:宋宏梅(1982~),女,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二) 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

难民(refugee)一词在国际法上有严格的定义。《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将难民定义为“现居住在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地方;因种族、宗教、国籍、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或政见关系,有确凿理由害怕遭到迫害;不能,或者因为惧怕迫害而不愿接受原居留国的保护,或返回到那里”。^①从公约的规定看,难民的定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即“政治难民”,早期从老挝逃往泰国的难民大多数符合该公约的规定,所以成为国际社会所称的“印支难民”的一部分。“经济难民”则是以经济为目的迁徙,并非躲避政治迫害,因其大多又是非法越境,故被纳入“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的一部分,不属于狭义上的难民。但是,当难民潮形成,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通常泥沙俱下,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混杂在一起。老挝苗族是在美国的秘密战争(Secret War)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美国政府为换取他们参战,对这部分人有过做出善后安排的相关承诺,因此对老挝苗族难民的甄别相对宽松,美国也接受了最多的老挝苗族难民,时至今日有近20万老挝苗族生活在美国。在西方国家的老挝难民有不少是经济难民,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接收的,但他们都具有难民身份。因此,本文未采取狭义上的难民定义,而是将生活在泰国难民营中的“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作为难民整体进行研究。

二、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发展脉络

1975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夺取全国政权并实行“社会革命”。大量的老挝苗族因此跟随王宝(Vang Pao)参与针对老挝人民革命党政府的秘密战争。战争失败后,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于是大量逃往泰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难民潮。^②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分阶段地对这些老挝苗族难民给予了帮助,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安置到十几个西方国家和地区。这些移居到西方国家的苗族难民90%以上都是以泰国为中转站,在泰国难民营里生活的时间长短不一,短则2、3年,长则20、30年。

(一) 进入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

有数据显示,1975年一年间就有6万老挝苗族族人逃往泰国,其中44000人被泰国难民营收留。^[2]自此开始,一般认为有三波老挝苗族难民潮。第一波:1975~1977年,主要是王宝、杨道(Yang Dao)等苗族反政府武装逃入泰国。第二波:1978~1982年,其中1979年形势较为严峻,在泰国难民营的估计有6万左右,另外每月还有3000多人企图渡过湄公河寻求避难。第三波:1982~1986年,难民数量继续增加。到这个阶段,逃入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数量不易准确统计,因为每个月或者说每天都有新的难民到来。这些难民绝大多数进入了难民营,少数担心难民营关闭的苗族难民则躲藏在丛林中,只有极少数潜回老挝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之后,随着苗族难民被大规模安置到西方,以及老挝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苗族的外逃现象逐渐减少,难民的绝对数量在80年代中期后逐步下降,但经济难民的比例在上升。笔者认为,在前三波难民潮之后,还有第四波难民潮(2005~2007年)。从2005年开始,泰国北部又出现大量老挝苗族难民,按照泰国官方的说法,这些难民是被最终会送达西方的谎言骗进泰国的。2007年8月间,泰国方面声称该年年初有7739名老挝苗族难民非法进入泰国。^③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09年4月3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发布的新闻摘要显示,这期间老挝苗族难民集中在碧差汶府的挽南考(Huay Nam Khao)难民营,2007年2月已被泰国遣返大约2000人,尚有5000多难民滞留此地。^④这一问题后来直到2009年才得到解决。

(二) 离开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难民

在泰国给出的老挝苗族难民出路的政策选项中,最优的选项是努力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合作,将难民送往第三国。1975年到8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按照正常的难民甄别和归化程序,每年都接收数量不等的难民。80年代中期后经济难民大幅增加,接收难民的口径随之收窄,1997年后美国接受老挝苗族难民的数量急剧减少。不过,从2001年开始,受“9·11”事件影响,美国削减了其他国家的移民配额,为苗

① 联合国难民署官方网站 <http://www.unhcr.org.cn>

② 王宝,亲美苗族领袖。

③ “寮国苗族难民出生率偏高”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2007年8月13日 <http://www.udnbkk.com>

④ UNHCR asks Thailand to clarify situation of BBC guide to Laos,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3 April 2009 <http://www.unhcr.org>

族难民留下了每年高达7万人的移民配额,这成了老挝苗族难民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末班车”。^[3]位于华富里的探克拉布寺(Wat Tham Krabok)从1975年开始大规模收容难民,90年代当其他难民营先后关闭时,大量老挝苗族难民逃往此地,最高峰时收容了35000人。长期滞留的难民于2001年后开始移民美国,2004~2005年间规模较大,此后此地只剩下个别苗族家庭。

第二选项是遣送回国。西方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对接纳老挝苗族难民态度消极,大量难民主要是经济难民因而滞留难民营,泰国不得不考虑遣返。在老泰关系改善后,泰国开始大规模遣返老挝苗族难民。1985年后,泰国将这些苗族难民集中在清康(Chiang Kham)难民营等待遣返,该难民营于1993年关闭,其他难民营在此前的1992年就已大多关闭。但是经济难民还是持续涌入,泰国政府因此又建了一些营地,1992年,班纳波(Ban Napho)难民营成了那些要被遣返的苗族新营地,“这些人被否决具有难民身份,并由此拒绝对其重新安置,该营地于1999年12月关闭”。^{[4] (P23)}

遣返只能减轻泰国的压力,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时至今日仍有零星的老挝苗族进入泰国。同时,遣返往往是强制进行,会引发人道主义问题和招致国际舆论批评。2009年泰国将挽留考难民营剩余的4000多名老挝苗族难民全部遣返,立即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人权团体尤其是在美国的苗族团体一直以来都声称被遣返者在老挝可能遭遇杀害或迫害。^{[4] (P25)}

第三选项是接受归化。在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泰国也接受了少量老挝苗族难民的归化,其中一部分本来就是泰国的苗族。1967年几千名泰国的苗族因人因泰国国内局势动荡从泰国迁往老挝,1975年这些人又因老挝国内局势变化迁回泰国。^{[5] (P113)}泰国政府给予归化的老挝苗族难民一些财政和教育方面的援助,允许他们加入泰国的苗族村庄或者另外自己再建村庄。泰国接受归化的数量很少,影响不大。

三、老挝苗族难民营的政治状况

决定老挝苗族难民营政治状况的首要因素是泰

国的政治倾向,其次是难民自身的政治倾向,最后是难民的联合行动。

(一) 泰国的政治态度

在1975年之前,泰国方面没有为老挝苗族难民提供任何基础设施方面的帮助。此后,在联合国和一些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泰国在老泰边境泰国一侧修建了好几个难民营,这些难民营的条件差异巨大,有些基本就是平地一块,难民需要自己搭建栖身之所,有些难民营仅有一些拥挤的营房,有些难民营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相当多的难民都住过这三种难民营,一般来说刚开始是生活在条件差的临时安置所,此后再转入条件稍好的难民营,在这里有简陋的医院和学校等,最后再转入条件较好的大的难民营,有较为宽敞的居所,有淋浴设施,有相对完善的医疗设备,如当时最大的维乃难民营(Ban Vinai camp)。难民营的条件和泰国的政治态度有直接关系。在印支战争结束初期,泰国把进入其境内的老挝苗族难民当作“自由战士”,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用做颠覆巴特寮的力量,因此态度相当热情,愿意改造难民营,或者腾出一些公用设施供他们使用。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难民的持续涌入,泰国政府深感难民成为一种负担,态度开始消极,甚至开始逮捕非法入境者,对难民的需求反应冷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政治难民比例下降,因此泰国方面说服联合国以“人道”的方式降低难民营的条件。如降低食物配给和将难民的身份甄别从适合于战乱时期的集体认定改为个别认定等,以此来减少经济难民数量,防止用于政治难民的有限的资源流入非政治难民群体。

(二) 难民的政治倾向

按照政治倾向,老挝苗族难民可分三类:第一类,梦想重回老挝;第二类,谋求前往西方;第三类,愿意归化泰国。第一类难民曾经大受泰国政府欢迎,但此后泰老关系改善,而这些人经常性地偷越边境袭击老挝,给泰国带来巨大麻烦,也给其他苗族人在泰国的境遇带来负面影响。第二类难民是最多数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据政治倾向应属于第一类,但因后来形势变化,慢慢转变为第二类,尤其是一部分先期到达美国的人在美国适应一段时间后,发回了许多美国生活的信息,并且还指出美国的土地肥沃适合农业,这消

除了许多人的疑虑。^① 第三类难民非常少,大多情况是因为找不到赞助他们前往西方的人或者团体,同时又可能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不愿意重回老挝。

(三) 难民的政治行动

老挝苗族难民在泰国难免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经常有难民营官员和泰国警察欺压难民,或者纵容一些匪帮对难民进行勒索。在很多难民看来,“泰国难民营管理官员,残酷而多变,难民们任凭官员摆布,如果稍微不从,就会遭到惩罚”。^{[6] [P66]} 难民营里曾出现过带有宗教色彩的苗族复兴运动——库豪运动(Koom Hanm Movement)。^[7] 该运动是一种宽泛的政治行动,政治功能并不是很强。

总之,从难民方面看,生活在难民营的老挝苗族因难民营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族群自身的政治局限,原有的政治目标逐渐失去号召力,而新的政治联合行动还很脆弱,所以几无政治发展。到后期随着经济难民比例上升,难民营给泰国造成的政治麻烦变少,难民营易于在泰国存在,但这也意味着难民营的政治庇护功能在不断下降。

从泰国方面看,泰国的难民政策大大减弱了苗族难民对老挝的敌视。一是因为泰国致力于将他们重新安置到第三国,为他们找出路。二是随着泰国的遣返政策和老泰关系的改善,使得以泰国为基地进行的反老活动的空间大大缩小,也因此消除了一部分人打回老挝的愿望。三是归化泰国的老挝苗族面临的是在泰国的发展问题,所以逐渐不关注老挝的问题。

四、老挝苗族难民营的经济状况

老挝苗族难民在难民营的生活总体上是非常艰苦的,没有形成基本的经济体系,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供应不稳定。但是,难民营还是有一定的经济活动,对改善生活状况有很大帮助。难民营的经济活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接受国际社会和慈善组织的救济;二是接受已经移民西方的亲戚汇款。这两项资金最为大宗,但几乎完全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和前往西方的储蓄。三是从事生产。和世界各地的难民营一样,泰国难民营也是被隔离的。苗族难民们不能自由走出营地,而且难民营大多设在偏僻山区。为了生计,苗族难民时常潜出难民营去干农活。泰国难民管理当局事实上也了解这一情况,但鉴于难民营生活

水平过低,一般情况下都采取默许的态度。所以,只要难民不走远,还是会“被允许走出难民营,去种植菜园和向泰国人找点农活干”。^{[8] [P13-14]} 四是参与商业活动。老挝苗族难民会单独或者有组织地参与一些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难民营内的商业活动。难民营里有苗族人自己经营的小店铺,主要的顾客对象是难民,偶有少数游客,销售的货物基本是苗族人的手工小物件,尤其是苗族的刺绣。对于这些商业活动,泰国的难民管理当局采取默许态度,但限制在难民营周围。二是难民营外的商业活动。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组织下,难民营里生产的一些刺绣由援助机构帮助销往世界各地。通过这类商业活动,苗族难民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苗族人建立起商务关系,西方的苗族人帮助争取订单,又帮助销售,不过这些商品主要还是在西方的苗族社区里消费。在老挝经济较封闭的时候,一些来自老挝境内的苗族手工艺品,也通过难民营与西方苗族的关系,先进入难民营然后再转销其他地方。

难民的经济状况尽管不佳,但总体上看,苗族的经济模式有了很大改变,反而有了更多的国际市场因素介入。从难民营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争取国际援助,其次是设法让难民营里具有自身生产能力,并为之提供市场帮助。

五、老挝苗族难民营的社会状况

泰国难民营里的苗族在动荡中经历了社会变迁,在社会组织、女性地位、教育与青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变化。

(一) 新的社会组织

苗族传统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亲属网络。亲属网络在苗族逃亡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依靠亲属间的相互支持,许多人克服困难到达泰国,接着又通过这个网络帮助还在老挝的亲属来到泰国。不过,难民营的分散和封闭以及逃亡过程的失散,使得大多数的亲属网络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另外,难民营的管理权掌握在泰国管理当局手中,亲属网络的权力核心——氏族领袖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苗族社会组织,从而催生了新的社会组织。

^① 在最初阶段前往美国的苗族人因为适应不良或者抱着希望难民营里的同胞继续斗争的政治目的,发给难民的信息基本是负面的,这让许多难民营里的苗族人心生畏惧,经过一段不长之后,这些信息才开始慢慢客观起来。

大多数老挝苗族难民内部新成立的社会组织是跨越氏族的,虽然组织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各个氏族领袖的手里,但组织的价值已经不是以单一氏族为取向,而是具有以苗族整个族群为取向的特点。另外一种社会组织是外来的,难民营里有许多外部社会组织进入,“至少有 50 个不同的组织在提供扫盲、健康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9] (P67)} 其中相当部分是泰国的基督教慈善组织。这些组织履行了难民营内部大部分的社会性职能,并推动难民们成立一些诸如防止流行病之类的志愿组织。这些新组织除了影响到氏族领袖在社会组织中的权力,还有取代亲属网络作为主要社会组织的趋势。

(二) 女性地位

在难民营中,女性地位有所提高,这主要归功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开发的刺绣项目,女性在难民营中变得工作繁忙,而擅长农活的男性则因缺少耕地而变得无所事事。另外,难民营的政策也对女性有利,诸如苗族的抢婚陋习等,在难民营管理当局和相关国际组织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在难民营的社会中,女性的基本权益反而易于得到“公力救济”。

(三) 教育与青年

难民营基本上都能提供初级教育,主要功能是扫盲,但条件较差,校舍不足,很多儿童无法上学。^{[8] (P13-14)} 更高级的教育根本没有,泰国政府并不提供渠道让难民儿童接受泰国的正规教育,而扫盲教育中,他们所学的泰语又无大的用处,难民总体上对难民营里的教育比较冷淡。苗族本身是看重知识和教育的,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难民营有约 600 名曾在老挝万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重新联合起来,专门负

责难民与相关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事务。“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成长起来,得到较好的地位,日后成为美国苗族社会的中生代领袖”。^{[10] (P35)}

难民营打破了一个族群原有的社会结构,催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女性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青年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观念。

参考文献:

- [1] 石茂明. 跨国苗族研究: 民族与国界的边界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2] 常州. 老挝难民问题 [J]. 东南亚纵横, 1988 (1).
- [3] 梁茂春. 美国赫蒙难民的历史与现状 [J]. 世界民族, 2013, (1).
- [4] Kathleen A. Culhane - Pera. Healing by Heart: Clinical and Ethical Case Stories of Hmong Families and Western Providers [M].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3.
- [5] Grant Evans.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 [6] Lillian Faderman.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M]. Beacon Press, 1998.
- [7] (法) 尼古拉斯·塔普. 泰国难民营中的苗人复兴运动 [J]. 民族译丛, 1989 (4).
- [8] Dia Cha, Normal J. Livo. Teaching with folk stories of the Hmong: an activity book [M]. Libraries Unlimited, 2000.
- [9] Julie Keown - Boma. Kinship Networks Among Hmong - American Refugees [M].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4.
- [10] Annette Lynch. Dress, Gender and Cultural Change: Asian Ame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Rites of Passage [M]. Berg Publishers, 1999.

[责任编辑: 王国平]

(11) **On Ancient Vietnam's Chinese Characters Identity and Its Evolution**

Zuo Rongquan • 73 •

Abstract: Ancient Vietnam had been on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ultural circle" countries. The ancient Vietnam society had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identification began from the County period and further was strengthened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ue to the French colonists deliberate suppression, the identification was shaken and ultimately replaced by the Latinized Chu Quoc Ngu. The identification in ancient Vietnam realized through three forms: the worship for Chinese square characters, the respect to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lassical, and orthographic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Vietnamese Chinese characters identification and history of its changes during the modern tim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Ancient Vietnam; Chinese characters; Identity; Changes

(12) **The Evolution in Malaysia's Language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Qian Wei • 80 •

Abstract: Malaysia'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went through several stages of evolution. It covers the stage of "English first", stage of "different origin of the language school isolated and coexist" and then stage of "monolingual assimilation policy", finally stage of "multilingual coexist". Malaysia'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s a result of competitions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nationalism, change of nationalities relatio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present Malaysia'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s more flexibility,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remain to be resolved.

Keywords: Malaysia;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Evolution; Reason

(13) **The Plights and Outlets of Local Chinese Newspaper in Indonesia in the Era of Democratic Reform——A Case Study of Qian Dao Ri Bao**

Pan Yue • 85 •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Suharto, in the era of democratic refor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paper have a lot of problems, including Qian Dao Ri Bao (Harian Nusantara). It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Local Chinese Newspaper in Indonesia. Qian Dao Ri Bao was beset by difficulties, such as few readers and news reporters, small circulation, high cost, little funds, poor quality of content and a dispute among the internal. How to survive in the difficult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must be solved by Qian Dao Ri Bao. As one of the few remaining Local Chinese Newspaper that operates independently, Qian Dao Ri Bao should changes for the better, for example realizing the electronic newspaper, increasing the earning with multi-approachs, attracting and developing qualified people, building up special features and enhance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Indonesia; Chinese Newspaper; Qian Dao Ri Bao; Plights; Outlets

(14) **On the Rise of Pakistan's MQM and Its Impact**

Yang Honggui, Li Dongyang • 91 •

Abstract: In 1970-1980s, with the loss of advanta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kistan's political landscape, Muhajirs began to strengthen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al union. In 1984, under the support of Muhammad Zia-ul-Haq, Muhajir Quami Movement (MQM) established. MQM claimed that i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Muhajirs, argues that Biharis should be accepted and settled in Sindh, and Muhajirs provi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cause the faith of separatism and the violent characteristics, MQM made a serious impact on Pakistan's (especially in cities, Sindh provinc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Pakistan; Muhajir Quami Movement (MQM); Rise; Impact

(15)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Caste and the Legal Evolution of India**

Liu Xiuli • 96 •

Abstract: The caste system is an ancient hierarchical system which has exi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India. It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law in India. Influence of the caste system on the laws of India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 in ancient times, the law embodied the caste system, and maintained the existence of the caste system; in modern time, law try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caste system, but the result is not optimistic.

Key Words: Caste System; Manava Dharma Sastra; Civil Law; Modern law; Influence

(16) **On the Problem of the Lao Hmong Refugees in Thailand**

Song Hongmei • 101 •

Abstract: The refugee problem of the Lao Hmong in Thailand came from Laotian domestic conflicts and changes of its foreign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o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os and Thailand. Settlement of the refugee problem depends on solving the domestic probl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e Lao Hmong lived in in refugee camps have had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t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refugee problems. Policy of recipient countries to refugee is an important fact to resolve refugee problem.

Key Words: The Lao Hmong; Refugee problem; Thailand; Settlement